
内 容 提 要

内 容 提 要

婚姻家庭立法作为保障婚姻自由,维护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工具得到我国政府的一贯重视。改革开放后,婚姻家庭领域的变革以及婚姻家庭立法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如何?婚姻家庭立法在改革开放后呈现的趋势如何?这种趋势对我国今后的婚姻家庭立法存在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文章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五章。

第一章对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过程及立法内容进行了概述,对其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政治运动中遭受的破坏做了介绍,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在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其存在的缺陷。

第二章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婚姻家庭立法为考察对象,通过对1980年《婚姻法》颁布的历史背景和1980年《婚姻法》中新内容的介绍,分析了1980年《婚姻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新的立法趋势——加强了国家对婚姻家庭领域的管理,扩大了家庭关系的调整,开始关注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等,同时结合1980年《婚姻法》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使命分析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章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索为背景,对这一阶段婚姻家庭立法的重大发展——更加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开始重视对夫妻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对家庭弱势成员保护的体系化、立法细致化等内容和趋势进行分析,指出该阶段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以后的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四章从2001年新《婚姻法》的制定入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确立为背景,通过对世纪之交婚姻家庭关系的新变化以及新《婚姻法》中新增内容和制度的介绍,分析了世纪之交,在个体本位取得与社会本位并重的立法价值取向的指引下,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所呈现的新的内容和发展趋势。

第五章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对新世纪的婚姻家庭立法进行了简要的展望,提出应抓住民法典制定这一时机,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早日实现婚姻家庭法向民法的回归。

关 键 词: 改革开放 婚姻家庭 婚姻法 立法发展

目 录

| | |
|----------------------------------|----|
| 导 言 | 1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 | 2 |
| 一、1950 年《婚姻法》与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构建 | 2 |
| 二、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冲击 | 4 |
| 三、小结 | 5 |
| 第二章 改革初期的婚姻家庭立法 | 7 |
| 一、1980 年《婚姻法》的制定 | 7 |
| 二、1980 年《婚姻法》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 | 8 |
| （一）结婚要件的调整 | 8 |
| （二）首次确立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 10 |
| （三）扩大了家庭关系的调整范围 | 11 |
| （四）确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离婚条件 | 12 |
| （五）确立了夫妻财产制 | 15 |
| 三、小结 | 15 |
| 第三章 改革的深化与婚姻家庭立法的拓展 | 17 |
| 一、改革的深化与婚姻家庭关系的演变 | 17 |
| 二、婚姻家庭立法的拓展 | 19 |
| （一）婚姻登记制度的完善 | 19 |
| （二）事实婚姻效力的演变 | 21 |
| （三）加强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 | 24 |
| （四）离婚理由的具体化 | 25 |
| （五）《收养法》的制定和修改 | 26 |
| （六）对家庭弱势成员的保护 | 28 |
| （七）《继承法》的颁布 | 30 |
| （八）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 | 31 |
| 三、小结 | 33 |

| | |
|-----------------------------|----|
| 第四章 世纪之交的婚姻家庭立法 | 35 |
| 一、世纪之交的婚姻家庭关系 | 35 |
| 二、新《婚姻法》的制定 | 37 |
| 三、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新发展 | 38 |
| (一) 建立了无效婚姻制度 | 38 |
| (二) 将婚外恋行为纳入婚姻法的调整范围 | 41 |
| (三) 夫妻财产制的完善 | 44 |
| (四) 限制了军婚的特殊保护 | 47 |
| (五) 设置了家庭暴力的救助制度 | 49 |
| (六) 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 51 |
| 三、小结 | 52 |
| 第五章 婚姻家庭立法的展望 | 56 |
| 一、新世纪婚姻家庭立法的新动因 | 56 |
| (一) 新经济发展背景下婚姻家庭关系面临新挑战 | 56 |
| (二) 人们对待婚姻家庭领域现象的态度更加宽容和开明 | 56 |
| (三) 民法典的制定为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 57 |
| 二、婚姻家庭立法的展望 | 57 |
| (一) 婚姻家庭法向民法复位问题 | 57 |
| (二) 完善婚姻家庭法的几个问题 | 61 |
| 结 语 | 70 |
| 主要参考文献 | 72 |

导 言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则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①。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每位公民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它的适用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在阶级社会早期，婚姻家庭制度主要由道德和习惯加以调整。进入封建社会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成文法才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我国历代法律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了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天权联合支配的婚姻家庭制度。这种旧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婚姻家庭的锁链，社会生活的桎梏，成为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停滞与落后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和立法工作。早在建国前，各革命根据地就有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条例。建国后，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即为《婚姻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是加大了婚姻家庭立法的力度。《婚姻法》历经两次修改，其间又增加了许多相关的单行立法，逐步形成了以《婚姻法》为基本法的婚姻家庭关系调整体系。本文以建国后三部《婚姻法》的制定为主线，通过对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过程的梳理，在探讨婚姻家庭立法与经济发展、观念和家庭变革的互动关系中，揭示婚姻家庭立法的规律和趋势，以期有助于今后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建设。

① 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主编：《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

一、1950 年《婚姻法》与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构建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我国形成了男尊女卑、包办强迫、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从 1927 年开始,在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对这种旧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并取得不错的成绩^①。建国后,在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废除“伪法统”的同时,我国着手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并于 1950 年 5 月 1 日颁布了首部《婚姻法》(以下称 1950 年《婚姻法》)。1950 年《婚姻法》共分 8 章 27 条,对婚姻法的原则,结婚制度,离婚制度,夫妻间的权利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1950 年《婚姻法》的着眼点在于废旧立新,即以法律的形式摧毁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构建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1、坚持婚姻自由。在封建社会,婚姻的缔结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男女本人没有婚姻决定权。在离婚问题上,丈夫有休妻的权利,即“七出”之条,但妻子却只能“从一而终”。1950 年《婚姻法》第 1 条宣布“废除包办强迫的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第 3 条和第 17 条又规定,结婚和登记离婚时都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他人不得干涉或强迫,充分体现了婚姻自由原则。

2、实行一夫一妻。历代封建法律虽明文规定一夫一妻,不准有妻再娶,但纳妾却不在此限。封建社会正是通过纳妾,形成实质上公开、合法的一夫多妻制。1950 年《婚姻法》中除宣布实行一夫一妻外,在第 2 条明确指出我国禁止重婚、纳妾。另外,1952 年 3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在《对“妾”提出离婚的处理意见》中将“妾”也视为配偶,规定“至婚姻法公布后的‘纳妾’行为,更应以重婚判处有期徒刑。”由此,彻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3、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在封建制度下,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妇女必须“三从四德”。1950 年《婚姻法》第 1 条即宣布废除男尊女卑,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同时在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赋予夫妻双方在家中平等的地位,赋予其平等地参加工作,平等地继承遗产和使用姓名的权利,规定夫妻“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

^① 1927 年以后,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利用法律武器,对旧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改革尝试,先后颁布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法》、鄂豫皖根据地的《婚姻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等适用于各个根据地的有关决议和法律,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为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建国后的婚姻家庭立法积累了经验。

权和处理权”。

4、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在没有婚姻自由，实行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妇女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护。同时，在封建社会，实行家长制，“父为子纲”，子女作为家长的私有财产而处于无权地位，其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障。1950年《婚姻法》宣布“废除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婚姻制度^①。在具体内容上，1950年《婚姻法》对妇女的保护体现在（1）女子怀孕期间和分娩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第18条）；（2）在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上，将女方婚前财产单独列出归女方所有，其他家庭财产则由双方协议或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时，共同财产不足以支付共同债务的，由男方清偿（第23、24条）。对子女权益的保护体现在（1）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禁止任何人危害或歧视（第15条）；（2）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视为父母子女关系（第13条）；（3）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不因父母离婚而消灭，“离婚时，有关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请求”（第20、21条）。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一方面全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使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平等和睦的新家庭正在不断产生。大批新中国的男女特别是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群众得到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因而更积极地参加了新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建设事业。”^②另一方面，国家政府部门针对《婚姻法》在实践适用中出现的问题，颁布了一些法规和司法解释，内容涉及结婚、家庭关系、继承、离婚、军人婚姻、民族婚姻、司法程序和其它有关婚姻家庭的问题。^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内务部制定，自195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办法》，对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程序，登记人员的职责，以及登记纠纷的处理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次完整地确立了婚姻登记制度，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创举。这些法规和司法解释使1950年《婚姻法》拥有了较完备的配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至此，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构建基本完成。

二、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冲击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八大确立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

^① 参见1950年《婚姻法》第1条。

^② 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9日第1版。

^③ 如1953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公与媳妇”、“继母与儿子”等可否结婚问题的函复》，1951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有关亲属继承等问题的批复》等。

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此国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是，从1957年开始，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四清运动”，继而全国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倒退的深渊，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刚刚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婚姻自由原则的背离。结婚上的“唯成分论”，出现了新的“门当户对”观念。结婚必须查三代，要求结婚的双方必须“根正苗红”。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提出的结婚请求不予办理。对于党员、干部的婚恋对象，往往由领导布置、审查、批准，出现了许多组织包办的政治婚姻。在离婚问题上，一方面强迫被打成“右派”的人与其配偶离婚，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限制离婚来达到阻止“轻率离婚”的目的。

2、政治命运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在家庭中也搞阶级斗争，划清阶级界限，导致家庭中父子成仇、夫妻互相揭发，极大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感情，违背了1950年《婚姻法》建立平等和睦家庭的初衷。

3、1950年《婚姻法》所废除的封建婚姻现象重新抬头。一些过去曾被破除的陈规陋俗死灰复燃，包办婚姻卷土重来，彩礼之风、铺张浪费之风盛行，妇女和儿童再次成为买卖的标的，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

4、在政治运动中，一方面许多地方将女子婚龄定为25周岁，甚至连25岁结婚也被称为“早婚”而遭到横加干涉^①。另一方面，早婚早育在农村增多，出现了“娃娃亲”、换亲以及近亲结婚等现象。1950年《婚姻法》有关结婚条件的规定得不到执行，导致我国人口在这一阶段翻了几番，给国家、社会以及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总之，在政治运动中，1950年《婚姻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得不到贯彻，50年代所取得的婚姻家庭改革成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三、小 结

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是实现我国解放妇女、推翻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也是我国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第一步。

从建国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视。1950年《婚姻法》是建国后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法律，在制定中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经毛主席亲自主持，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要成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就有两次^②。

^① 参见戴伟著：《中国婚姻性爱史稿》，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② 参见陈绍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过程和起草理由的报告》，载于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从建国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1950年《婚姻法》完成了废旧立新的任务,它所构建的新婚姻家庭制度具有自由、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本涉及了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成为以后婚姻家庭立法的基础和指导思想。可以这么说,1950年《婚姻法》在我国整个婚姻家庭制度改革中居于核心地位。

但改革前的婚姻家庭立法存在许多不足:

1、重婚姻关系轻家庭关系,重人身关系轻财产关系,重道德说教轻法律制裁。1950年《婚姻法》的27个条文中仅有4条是有关家庭关系的规定,而且这4条也仅仅局限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调整。对于财产关系,1950年《婚姻法》的调整过于单薄,如夫妻之间的继承权,法律只是原则性进行了规定,承认夫妻有互相继承的权利,但对于如何行使该权利,《婚姻法》却没有具体内容。另外,1950年《婚姻法》为人们提供了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行为模式,但遗憾的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社会主义道德在1950年《婚姻法》中的作用得到了凸显,但法律所固有的强制性、惩罚性功能却相对较弱。

2、立法粗糙。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立法是我国早期的立法实践,当时为了尽快结束婚姻家庭领域无法可依的状况,立法过于仓促^①,致使1950年《婚姻法》略显粗糙。由于立法重在废旧立新,所以缺乏前瞻性,对许多问题规定得过于原则。如《婚姻法》中规定了夫妻对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理权,但没对财产的范围和权利的具体行使做出规定。在生产水平较低、婚姻家庭关系较简单的建国初期,这些不足的影响并不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靠二十几条概括性法规,是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婚姻家庭关系调整需要的。

1957年以后,受“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婚姻家庭立法几近停滞。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1950年《婚姻法》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① 从1948年冬成立起草小组到1950年4月13日被通过仅用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

第二章 改革初期的婚姻家庭立法

一、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

文革结束后,1978年全国开展了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文革期间盛行的“左”倾思想的束缚,在全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决策,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它还着重指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迫切任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要求“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①法制的作用得到重新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家庭立法受到了应有的重视。1978年11月全国妇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成立了婚姻法修改小组,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起草了婚姻法。1980年9月2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1980年《婚姻法》)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于1981年1月1日生效。

1980年《婚姻法》共5章37条,在条文数量上明显多于1950年《婚姻法》,在结构上则与1950年《婚姻法》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将1950年《婚姻法》中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和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两章合为家庭关系一章,将离婚及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统一列入离婚一章,使《婚姻法》的结构设计更为合理。在内容上,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继续坚持禁止重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等方针。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婚姻法》第3条第1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从而将一切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都纳入法律禁止的范围,加大了对婚姻自由的保障力度^②。

二、1980年《婚姻法》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

(一) 结婚要件的调整

结婚要件是法律对婚姻自由的必要限制,是国家对婚姻行为进行干预、审查和监督的有效手段。1950年《婚姻法》及1955年的《婚姻登记办法》曾规定了结婚的法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② 1950年《婚姻法》第1、2条规定了法律所禁止的干涉婚姻自由的具体行为,如禁止童养媳,禁止包办强迫、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和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但并没有明确将一切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都纳入法律禁止的范围。

条件和程序,较好地“体现了婚姻自由问题的自由与纪律的统一”。^①1980年《婚姻法》对结婚要件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1、提高了法定婚龄

确定法定婚龄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如人们的生育及发育状况),二是社会因素(如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口状况。^②在旧中国,历代王朝和政府为了增加劳役,增收人头税,大都提倡早婚^③。但实际上,早婚是对妇女身心的一种摧残,它对结婚双方本人的健康,对其子女的健康,对整个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④。

1950年《婚姻法》参照苏联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将法定年龄定为男二十,女十八,这相对于旧的婚姻家庭制度而言是一项重大的改变。但我们发现,这一规定对法定婚龄的表述过于含糊,即它未明确规定婚龄必须为周岁,而我国民间对年龄一般采用“年头”计算,而不以周岁计算,这实际上使人们能够适当提早结婚。^⑤

到了70年代,为控制人口,国家开始推行男二十五岁、女二十三岁为最低婚龄的晚婚政策,由各地婚姻登记机关掌握执行。这一时期,许多省市按晚婚年龄来执行婚姻登记,甚至有些省市还加以提高。^⑥这导致婚姻登记实践与《婚姻法》的规定不统一,青年男女依法享有的婚姻自由权利因此受到法律之外的限制。

1980年《婚姻法》制定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早期的婚姻法宣传,人们已普遍接受了推迟结婚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控制人口再生产。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法定婚龄是必要和可能的。

由于我国有关婚龄的规定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了^⑦,如果婚龄提高的幅度过大,违反了青年的生理特点,只会造成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增多,影响社会秩序,破坏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所以,1980年《婚姻法》在确定婚龄问题上非常慎重,立法机关前后三次

① 杨大文:《论婚姻自由》,载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婚姻法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② 陈苇、宋豫主编:《结婚与婚姻无效纠纷的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③ 从宋朝以后直到明清,法律上规定的结婚年龄均为男十六,女十四。参见王德意:《为什么修改法定婚龄》,载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婚姻法宣传手册》,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④ 陈绍禹,前引文,第58页。

⑤ 该规定的表述实际上是立法者的费心之举,目的是顾及许多农村的习惯,使婚姻法在初期即能在全国各地普遍有效的执行。参见陈绍禹,前引文,第58页。

⑥ 如福建省《闽革79年23号文件——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就提出在婚姻登记时执行农村男25周岁,女23周岁;城镇男26周岁,女24周岁的晚婚年龄。

⑦ 日本为男满18岁,女满16岁;英国为男14,女12岁;法国为男18,女15岁;美国各州立法男18、女16岁结婚的有15个州,男16、女14岁的有8个州,男18、女15岁的有6个州,男17、女14岁的有3个州;苏联为18岁,在个别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降低,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年。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编:《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174页。

向全国 28 个省市征求意见,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还做了民意测验。^①最后,由于婚龄的高低与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矛盾^②,因此 1980 年《婚姻法》没有采纳与晚婚政策保持一致的意见。同时,它也改变了 1950 年《婚姻法》对婚龄的特殊表述,在第 5 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但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婚姻问题上许多少数民族有其各自特点,为了保证婚姻法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执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婚姻法》第 36 条规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婚姻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对婚龄制定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于是,1980 年《婚姻法》颁布后,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通过制定变通规定的方式,仍然保持了 1950 年《婚姻法》有关婚龄的规定。如 1983 年 7 月 20 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变通规定》中就规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女十八。

2、废除了中表婚

中表婚即表兄弟姐妹间的通婚^③。建国初,受苏联立法的影响^④,1950 年《婚姻法》第 5 条规定,对直系血亲以外的“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当时,立法者认为,表兄弟姐妹间的通婚“比远古时代人的两个不属于同一血统内氏族或部落的人之间通婚的血缘关系实际上还要远得多”,“除非通婚者本人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积累地遗传下来的严重弱点和缺陷的情况之外,一般地是没什么坏的血统遗传影响的。”^⑤

然而,遗传科学研究表明,旁系血亲间结婚本身所隐含的遗传祖辈的弱点和缺陷的可能性较其他情况大。统计表明,一些隐性遗传病如先天性聋哑的发病率,表兄妹婚配是随机婚配的 7.8 倍;先天性鱼鳞病的发病率,表兄妹婚配是随机婚配的 63.5 倍^⑥。为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就必须禁止近亲通婚。1980 年《婚姻法》第 6 条规定“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彻底废除了中表婚。

(二) 首次确立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建国后,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57 年已达 6.8 亿。在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知名人士的呼吁下,1956 年国家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提出“在一切人口稠密的

① 参见巫昌桢主编:《婚姻法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6 页。

② 由于结婚与生育是分开的,婚后通过思想教育,鼓励晚育,提高青年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从而提高避孕药具的效能,那么仍然可以起到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参见康克清:《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和执行新〈婚姻法〉》,《中国法制报》1980 年 9 月 19 日第 1 版。

③ 马忆南著:《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7 页。

④ 1926 年《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直系尊卑亲属间以及完全血亲或不完全血亲之兄弟姐妹间的婚姻不得登记”,由此并不禁止中表婚。

⑤ 参见陈绍禹,前引文,第 61 页。

⑥ 王廷桢等主编:《优生优育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6—167 页。

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但由于毛泽东受近代一些先驱者人口思想的影响，认为“人多力量大”，于是忽视并错误批判了马寅初的主张，造成我国人口再次盲目增长，1964年底突破7亿大关^①。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1962年国家发布了《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既定的政策。但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计划生育工作陷于停顿，全国出现了长达6年的生育高峰^②，这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也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50—198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4%，而同期内人口每年平均增长1.9%，结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2.3%^③。为控制人口，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政府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全面推行。而生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单位，对家庭生育制度的调整自然成为实现基本国策的重要手段。于是，1980年《婚姻法》第2条首次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使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从而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三）扩大了家庭关系的调整范围

1、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

1950年《婚姻法》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第16条“夫对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于其夫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这一规定不仅表述过于复杂，而且其内容仅原则性地禁止继父母子女间的虐待或歧视，充其量只是起道德宣教的作用。对于继父母对继子女是否负有抚养义务，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适用父母子女关系，该规定均未提及。所以，在1950年《婚姻法》中，继父母子女关系并未被纳入父母子女关系中。1980年《婚姻法》将“夫与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以及妻与其夫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关系”统一称为“继父母子女关系”，除仍保留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的内容外，该法第21条明确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由此将继父母子女关系纳入父母子女关系，扩大了婚姻法所调整的父母子女关系的范围。

2、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1950年《婚姻法》的内容主要针对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其它诸如（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婆婆与儿媳、女婿和岳父母等关系都未纳入婚姻法的

① 杨遂全著：《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② 1967-1977年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达2.6%。参见赵学董、何景熙著：《人口激增的挑战与对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③ 赵学董、何景熙著，前引书，第36页。

调整范围。但是,建国以来,在家庭结构中,以(外)祖父母、儿媳(女婿)、(外)孙子女等组成的主干家庭仍然是家庭的主要模式^①。在家庭关系中,(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是关系密切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则是关系最近的旁系亲属,赋予其相互之间一定的权利义务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传统观念的。因此,1980年《婚姻法》在第22条中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另外,第23条还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这些规定将一定条件下的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纳入了婚姻法的调整范围,它是1980年《婚姻法》第2条新增“保护老人合法权益”原则的具体化,也是我国尊老爱幼传统道德的体现。这样一来,一方面将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失去子女的孤寡老人的抚养问题交由家庭内部处理,缓解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更好地保障被抚养人的生活,促进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和睦。

(四) 确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离婚条件

法定离婚条件是指准予判决离婚的法律依据^②,它是婚姻法的重要内容。早在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暂行婚姻条例》第16条就规定:“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均得请求离婚。”第一次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标准。

建国后,为保障人们的婚姻自由,1950年《婚姻法》第17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它对离婚条件几乎没有设置什么限制,这在当时有助于人们排除阻挠和干涉,实现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的愿望。1950年之后,我国出现了离婚的第一次高潮,有效地完成了建国初废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解放妇女的任务。

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但男女双方的离婚数仍继续上升。其中,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因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喜新厌旧,轻佻放荡,对子女不负责任等)所造成的离婚行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③。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这是1950年《婚姻法》缺乏离婚理由的规定导致的。他们认为,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只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合法化,加剧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滋生和蔓延,增加轻率离婚的现象,使妇女们陷入新的迫害中^④。

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0—1981年对江苏、浙江、陕西、四川等7个地区的调查,在家庭中主干家庭占55%。参见马侠:《农村婚姻、家庭、生育率调查之二》,转引自潘允康主编:《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② 任国钧著:《婚姻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③ 李逸尘:《试论我国当前离婚的主要原因及处理离婚问题的根据》,《政法教学》1958年第2期,第22—24页。

④ 马起:《试论离婚政策界限》,《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第178—179页。

在理论界,以幽桐的《对于当前离婚问题的分析和意见》^①一文为起点,学者们开始了有关离婚法定条件的讨论,主要形成感情论和理由论两大阵营^②。感情论认为,法院判决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标准。^③理由论则认为,是否判决离婚,关键看有无正当理由。对于因一方过错如另有新欢等而引起的婚姻纠纷,即使感情破裂也不应准予离婚,以防止错误思想的发展,体现法律的约束或惩罚作用^④。在这场论争中,由于理由论迎合了当时“左”倾思想的论调,于是迅速在讨论中占了上风。受这场争论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时期的相关司法解释大都带有理由论的影子。如195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劳动教养人员离婚问题的复函》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离婚问题,应与处理一般公民的离婚问题相同,经向双方调解教育无效后,若一方仍坚持离婚而有正当理由时,应判准离婚,若无正当理由则可判决不准离婚。”直到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意见》中也还坚持要求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⑤

但在1963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第2条“对于离与不离的基本原则界限问题”中,虽继续坚持对由于一方确实因资产阶级思想、喜新厌旧,腐化堕落提出坚决离婚的,“法院应协同有关部门,支持有理的一方,严格批评教育错误的一方,促使双方和好,不要轻率判离。”但同时又规定“对那些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确实不可能和好的,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思想工作,判决离婚。”由此,在理由论盛行的时期,再次出现了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条件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思想在人们意识中的控制地位得到削弱,人们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考察婚姻的本质以及离婚条件理由论的正确性。其中,司法实践部门认为,二十几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依理由论处理离婚问题并不能阻止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而导致的离婚,强行维持无爱情的死亡婚姻,不仅会加深双方的痛苦,而且也会给社会留下隐患^⑥。在学术界,对离婚条件的认识则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感情论、理由论和感情义务结合论^⑦。其中,感情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婚姻的唯一

① 该文章发表于1957年4月13日的《人民日报》,幽桐在文章中提出离婚案件的绝对数字是逐年减少的,不必为此惊惶,提出法院判决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标准。

② 195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离婚问题论文选集》是这场理论论战的成果体现。

③ 参见幽桐:《对于当前离婚问题的分析和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第7版。

④ 参见张友渔、王叔文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7页。

⑤ 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意见》中规定,“原来婚姻基础、婚后感情较好,一方出于资产阶级思想,坚决提出离婚,而对方又坚决不同意的,法院应协调有关部门,严格批评教育有错误的一方,促使双方和好,一般应判决不准离婚。”

⑥ 参见巫昌桢:《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四十年(下)》,《政法论坛》1989年第5期,第17页。

⑦ 感情义务结合论者主张,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婚姻的基础中既有爱情的因素,也有其他因素。处理离婚问题不能把爱情看作唯一的条件,而应把爱情和双方的义务、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考虑。同上,第18页。

基础是爱情,所以反映在离婚法定条件上,是否判离,应当看当事人双方感情是否破裂。离与不离的判决只能用作决定夫妻关系存在或消灭的手段,不能用作惩罚错误思想或行为的手段。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的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①当夫妻感情破裂,如不及时处理,非要强调离婚的正当理由,只会激化矛盾导致社会不安定。

由于感情论符合夫妻关系以感情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婚姻观点,所以在理论探讨中大获全胜,成为1980年《婚姻法》制定中处理离婚问题的主导思想。立法者们也接受了感情论的观点,认为对于喜新厌旧、道德败坏是批评教育的问题,由党纪国法给予纪律或法律处分。对于其离婚要求本身主要仍应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②。于是,1980年《婚姻法》彻底抛弃了理由论,其第25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而,真正确立了“感情破裂”的法定离婚条件。

(五) 确立了夫妻财产制

建国初,在生产水平较低,家庭财产不多的情况下,195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很少,仅在第10条概括地规定了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之后,经过30年的实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夫妻拥有的财产较之建国初也增加了许多。于是,1980年《婚姻法》改变了1950年《婚姻法》的概括性规定,在其第13条新增了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将夫妻共同财产制规定为法定财产制,明确把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限定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婚姻法》还明确允许夫妻就财产关系自行约定,并赋予其优先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效力。^③

1980年《婚姻法》较好地预见到改革开放后可能出现的公民财产不断增多的趋势,开始关注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立法上一定的前瞻性。它所体现的对夫妻之间意思自治的尊重,是当时立法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立法内容的一大创新。这不仅体现出立法意识的超前性,而且也为夫妻双方协调财产关系置入了民主、宽松的因素,这对破除“夫妻一体主义”的财产观念是具有积极作用的。^④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页。

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武新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的实施新〈婚姻法〉的三个问题》(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人民日报》1981年2月11日第4版。

③ 在陈绍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过程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提到“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的约定方法来解决。”但在1950年《婚姻法》的正式条文中并没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而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则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明确允许夫妻双方对财产进行约定。

④ 王歌雅:《关于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建议》,《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第100页。

三、小 结

1980 年《婚姻法》产生于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它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正因为如此，整部法律基本上沿袭了 1950 年《婚姻法》的框架，重申了 1950 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行之有效的规定，具有明显的继承特点。同时，1980 年《婚姻法》还根据建国后 30 年来婚姻家庭领域的新变化，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基本满足了我国从改革旧的婚姻家庭制度转移到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婚姻家庭建设的转变要求。它对稳定社会的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1980 年《婚姻法》作为改革之初的婚姻家庭立法，在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它存在以下不足：

1、1980 年《婚姻法》加强了国家对婚姻家庭领域的管理和控制，如法定婚龄的确定、中表婚的废除和计划生育原则的确立主要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基于控制人口、发展经济和提高全民素质的考虑，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要求。虽然在制定时也考虑了遗传学、优生学上的科学依据以及青年的生理发育需要，但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仍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唱主角。

2、立法思想仍过于谨慎和保守。如 1980 年《婚姻法》第 1 条虽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在立法过程中曾一度将立法草案命名为“婚姻家庭法”，但为了保持法律的延续性，最后在正式稿中仍沿用“婚姻法”。另外，在 1980 年《婚姻法》中，虽然立法者已开始关注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但在改革初期，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下，这种关注是非常有限的。如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在 1980 年《婚姻法》中仅仅是一笔带过。1950 年《婚姻法》重人身关系轻财产关系、重夫妻关系轻家庭关系、重道德说教轻法律制裁的弊端并没有被根除。

3、虽然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一方面 1980 年《婚姻法》在制定中所存在的“宜粗不宜细”、“不求全面系统”的思想使法律条文呈现过于简单、空泛，司法操作性差的特点。如离婚条件作为对离婚自由的限制，其意义重大。但在 1980 年《婚姻法》中却仅有一款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感情破裂的把握不得不依靠法官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由于 1980 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历史背景下，而法律的适用则是在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摸索的环境中，前一背景下的婚姻家庭关系相对简单，但后一环境下的婚姻家庭关系则处在剧烈的变革中。这种立法背景与适用背景的较大反差使 1980 年《婚姻法》的 37 个条文远远不足以调整日益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